

《國語》作者與年代問題綜論 ——以開放文本為分析視角*

張永路*

提要

20 世紀初，隨著史學界疑古風潮的興起，傳世古書的真偽問題成為當時學界討論的重點話題，特別是與今古文之爭糾纏在一起時，問題變得越發的複雜。《國語》一書便是在這種複雜語境下，因著《左傳》的問題而被牽涉於討論之中的。由於時代背景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國語》的一些最基本問題，如作者和年代等，並沒有在長期而廣泛的討論中達成共識，尚有許多爭論與問題。因此，本文便著眼於此，以作者和年代為主題，對 20 世紀以來的《國語》研究進行一次梳理，力圖完整呈現前輩時賢對此所作的種種努力，並嘗試著澄清其中的問題所在，以進一步理清《國語》的成書過程。

關鍵詞：《國語》 作者 年代 開放文本

*本文之修改，承蒙導師張立文先生細心指正，在此特致謝意。兩位匿名評審人也為本文修改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Author and Time of Guo Yu: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Open Text

ZHANG Yong-lu*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suspicion about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authenticity of literatu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became a focus in history stud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it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New Text and the Old Text of the Classics, this problem grows more complex. In such complicated context, Guo Yu comes into the discussion because of Zuo Zhuan. However scholars did not reach consensus on some basic problems of Guo Yu such as the author and time. This article,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issue and reviews correlation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so as to clarify those problems and forming process of Guo Yu.

Key words Guo Yu author time the open text

*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0 世紀初，隨著史學界疑古風潮的興起，傳世古書的真偽問題成為當時學界討論的重點話題，特別是與今古文之爭糾纏在一起時，問題變得越發的複雜。《國語》一書便是在這種複雜語境下，因著《左傳》的問題而被牽涉於討論之中的。當然，也正是因此，歷代留滞在《國語》一書上的種種問題獲得了澄清和解決的機會。之後，隨著學界研究範圍的擴展，以及對新材料的渴求，《國語》研究在 20 世紀後期以及 21 世紀初，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可以說，這一個多世紀以來，《國語》研究是伴隨著現代學科以及研究方法的逐漸確立而發展起來的，其研究成果也由此最先跳出了傳統注疏研究的窠臼，呈現出現代學術的氣象。但是，由於時代背景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國語》的一些最基本問題，如作者和年代等，並沒有在長期而廣泛的討論中達成共識，尚有許多爭論與問題。因此，本文便著眼於此，以作者和年代為主題，對 20 世紀以來的《國語》研究進行一次梳理，力圖完整呈現前輩時賢對此所作的種種努力，並嘗試著澄清其中的問題所在，以進一步理清《國語》的成書過程。

一、有關作者的討論

有關《國語》的作者，就目前所見的史料而言，最早對此做出判定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談及往聖前賢遭遇困厄而發奮有成時，說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據此可知，在司馬遷看來，《國語》是左丘所作，而且是其在失明的情況下完成的《國語》一書。但是，司馬遷並未在此明言左丘即是左丘明。那麼，司馬遷在其他地方的論述又是如何呢？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司馬遷分別提到了左丘明和《國語》：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逞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見《春秋》、《國語》²，學者所讖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¹ 有關「左丘」、「左丘明」的姓名討論，後世學者糾結於此者甚多。據張以仁先生的考察，自宋人葉夢得指出：「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春秋考》）之後，多有學者糾結于此姓名問題。其中，或有認為作《國語》者複姓左丘而單名明字，如衛聚賢；或有認為其為姓左名丘者，如梁啟超。對此，張氏引了大量證據以證明左丘明非複姓左丘，而對第二種論點，張氏則認為據司馬遷所說，「孫子臏腳」是為孫臏，「左丘失明」則應是左丘明。（詳見張以仁：〈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收於《張以仁先秦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27—137。）但是，張氏對第二種論點的反駁並不讓人信服，因其所舉只是孤例，《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此所說「西伯拘美里」、「孔子厄陳、蔡」、「屈原放逐」、「不韋遷蜀」、「韓非囚秦」等皆非此類。在此，我們並不會繼續糾纏于此類問題，不管司馬遷所說之左丘是姓左名丘，還是複姓左丘而另有其名，我們只據司馬遷所說之有限證據，稱作《國語》者為左丘。

² 此處應是《春秋》與《國語》，而非《春秋國語》。

司馬遷在此認定左丘明寫成《左氏春秋》，至於《國語》則是自己撰寫《史記》的參考資料。而對於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司馬遷並未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對於這一問題，在另一篇著錄於《漢書·司馬遷傳》中的《報任少卿書》中，有一處貌似很明確的判定。在一如上述所言的舉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後，司馬遷進一步論述道：「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由此看來，司馬遷仿佛明確將《國語》的作者認定為左丘明。但是，《昭明文選》所錄司馬遷此文卻偏偏在「左丘」之後沒有這最為關鍵的「明」字，而且《史記》的一些版本中，也無「明」字，讓人突然有些不知所措。³

關於《國語》的作者，最早談及這一問題的司馬遷，除了上述這一因版本問題打了折扣的證據之外，並未給我們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而對於那些明確聲稱司馬遷認定《國語》為左丘明所作的觀點，我們是持保留態度的。總結來看，司馬遷明確提到的《國語》作者是「左丘失明」之左丘，而此左丘是否與完成《左氏春秋》的左丘明為同一人，司馬遷並未給出一個百分之百準確的判定。當然，我們可以說，司馬遷既然沒有特意解釋《國語》之左丘與《左氏春秋》之左丘明為二人，那即是說明在其看來，這不成為問題，也即是在司馬遷看來，二者是同一人。在司馬遷為我們提供的一系列有限證據之上，我們便可作出這一邏輯的推定。由此，在整個兩漢時期，以班固《漢書》、王充《論衡》為代表所呈現出的漢人觀點，都是認定左丘明既作《左傳》又撰《國語》的，一直到三國時期作《國語解》的韋昭，都是如此。但是，這終歸是推定，從晉人傅玄開始，便逐漸有學者質疑《國語》為左丘明所作的傳統觀點。傅玄之下，還有隋人劉炫，唐人啖助、趙匡，宋人朱熹、葉適、陳振孫、葉夢得，清人姚鼐、趙翼、崔述，其間各人觀點雖有差異，但都可歸入質疑反對一類中。

進入 20 世紀後，現代學術隨著大學制度的引進而逐漸確立起來，特別是現代研究方法的確立，極大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展，為一些傳統問題提供了新式的解決途徑，而這便包括歷代積留在《國語》一書上的種種問題。《國語》之所以在 20 世紀初被眾多學者關注和研究，還主要得益於康有為極具爭議性的論點。康氏在其《新學偽經考》中，為經今文學派張目，極力貶斥古文諸傳，特別是其中的《左傳》。⁴康氏認為，左丘明只作了《國語》，並無所謂《春秋傳》即《左傳》。因《漢書·藝文志》除了署名左丘明的《國語》二十一篇之外，尚有五十四篇《新國語》，題為劉向所分，康氏便以此為據，認為：「蓋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為《春秋傳》，於是留其殘賸，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為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⁵經過康有為的這種大膽假設，《左傳》便成了偽書，而今本《國語》雖然是左丘明原著，但是已是劉歆大幅修改後的樣貌了。

³ 王先謙、王念孫都指出《史記》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更認為「明」字乃後人增入。詳見張以仁：《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 136。

⁴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初版於 1891 年，隨後被清廷屢次禁毀，直至 1917 年再版。

⁵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臺北：宏業書局，1987 年），頁 75。

康有為的論點雖然是想象成份居多，稱其為假說更為合適，但是這一論點因極具代表性與挑釁性，使得隨後的學者不得不正視，並努力尋獲更多的科學證據以支持或反駁他。最先掀起討論熱潮的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由於高氏所采取的新的科學方法，使其所作《左傳真偽考》迅速被翻譯進來，並引起了眾多學者的回應。在此文中，高本漢選擇了七種助詞，如「若」與「如」、「及」與「與」、「於」與「于」等，借以比對《左傳》與先秦諸種古籍的文法，最後得出結論「周秦和漢初書內沒有一種有和《左傳》完全相同的文法組織的，最接近的是《國語》」，但是因為《左傳》和《國語》之間有著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點，即解作「像」時，《左傳》用「如」，而《國語》用「若」和「如」，所以這兩書不能是一個人作的。⁶對於《國語》的作者問題，高本漢采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只是指出《左傳》、《國語》並非同一人所作，但是其研究方法在當時確實是非常進步的。因此，高文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激烈討論，更多的學者開始利用其方法比對《左傳》與《國語》的異同。衛聚賢除了比對兩書的文法外，還對其記載、佈局、文體進行了比較，逐步得出有關《國語》作期、作地的結論，最終認為《國語》一書全由左丘明子孫所完成，從其孫左人郢開始至郢之玄孫分篇撰就。⁷孫海波同樣是詳細比對了《左傳》、《國語》、《史記》三書記事異同，認為《左傳》與《國語》並非一書分化，但他最後認定《左傳》即是原本《國語》，而今本《國語》則是劉歆偽造，又使他回到今文家的立場上去了。⁸美國學者卜德(Derk Bodde)通過比較《國語》與《左傳》的引《詩》次數、稱「帝」與「上帝」次數，以及敘事異同，指出兩書並非一書分化，並認為兩書非同一人所作。⁹

因康有為極具爭議的論點引發的這場討論，最終在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的支撐下逐漸平息下來，留存的問題雖然仍舊很多，但是大多數學者通過高本漢提供的研究模式進行比較研究後，都認同《國語》、《左傳》兩書非一人所作的結論。而有關《國語》作者的問題，雖然仍有人間或提及¹⁰，但也沒有得出某種明確共識。這一問題的再次討論，要到 20 世紀後半期了。

在這段時期中，特別是 80 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範圍的擴展，《國語》的重要性逐漸為人們所肯定，有關專門研究開始出現，作者問題仍舊是最先關注的問題。與先前稍有不同的是，在繼承高本漢研究方法並將之發展之後，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了《國語》作者問題的複雜性。沈長雲通過分析《國語》一書，指出其中的很多事件、制度是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無法看到

⁶ 高本漢：〈左傳真偽考〉，收於《左傳論文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76 年），頁 55、56。

⁷ 衛聚賢：《古史研究》（上海：新月書店，1928 年），頁 255。

⁸ 孫海波：〈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第 16 期（1934 年 12 月），頁 193。

⁹ 卜德：〈《左傳》與《國語》〉，《燕京學報》第 16 期（1934 年 12 月），頁 167。

¹⁰ 章太炎仍然認為《國語》為左丘明所作，而且是在其晚年。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252；錢穆則認為《國語》各篇雜出自鐸椒、虞卿諸家，「而諸家書皆采《左氏》，故史公亦遂以《國語》歸之左氏爾。」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53；洪業認為《國語》乃是采數種書而成，因此成此書者只可稱為編者，而《國語》、《左傳》敘事、文法不同，則此編《國語》者「與撰《左傳》者，殆非同一人。」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80、81。

的，所以《國語》斷非左丘明所作，而應是出於韓趙魏三晉人之手。¹¹譚家健則是通過分析《國語》和《左傳》在體例、文字、思想上的差別，認為「《國語》成書當在《左傳》稍前，其時當在春秋末和戰國初，其人可能是三晉史官。」¹²王樹民在分析《國語》的成書過程後，指出「《國語》為集合故有之資料而成書，決非出於一人之手筆」，並認為編《國語》之人即是司馬遷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左丘，而非左丘明，此左丘應為趙人，或與趙國接近之人。¹³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也都認同《國語》非出自左丘明之手。¹⁴但是，同時也仍舊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繼續持傳統觀點¹⁵，認為《國語》作者是左丘明，其中殷孟倫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說：「疑古而無確證即應疑疑古者而信成說」。¹⁶這種觀點當然也有其合理性在焉，所以才有了相當一部分學者對傳統觀點的支持，但殷氏的說法多少帶有些無可奈何的意味。

通過對《國語》作者問題的考察梳理，我們或許會沮喪地發現，現在仍然沒有我們所希望的明確的共識，仁者自說仁，智者自說智。以此看來，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在沒有幸運地得到出土材料證明的情況下，問題依然不會解決。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由高本漢所引發的研究方法的創新為現代學術的建立提供了助力，而這些研究方法也將《國語》作者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因而成為問題解決的關鍵。總結起來，這些方法可以分為：

- 一、 文法比較，即比較書籍之間的文法，如高本漢；
- 二、 同事比較，即比較書籍所載相同之事，如孫海波、卜德；
- 三、 語匯比較，即比較書籍中所用特定語匯，如卜德、譚家健；
- 四、 思想比較，即比較書籍中所含的某種思想，如譚家健；
- 五、 本身考察，即考察書籍中所載事件或制度，如沈長雲。

¹¹ 沈長雲：〈《國語》編纂考〉，收於《上古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32。

¹² 譚家健：〈關於《國語》的成書時代和作者問題〉，《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5年6月），頁6—14。

¹³ 王樹民：〈《國語》的作者和編者〉，《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601—604。

¹⁴ 顧靜：〈《國語譯注》前言〉，《國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3；同文見於金良年：〈國語導讀〉，《國語》（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頁4。來可泓：〈《國語直解》前言〉，《國語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0。

¹⁵ 徐仁甫受康有為影響，認為《左傳》是劉歆采《國語》並旁及先秦漢初諸書而成，《國語》則是左丘明所作，而且此人姓左丘名明。徐仁甫：〈《左傳》疏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19；李寶通認為《國語》實為左丘明所作，但司馬遷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並非說左丘明目盲，而是指「失其明細」。李寶通：〈「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新解〉，《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6年11月），頁63—67；劉建國認為左丘明作《國語》早期史家及歷代史志都有記載，而且與《左傳》時代與內容都相合，所以二書同為左丘明所作，而且是左氏先作《左傳》後失明作《國語》。劉建國：《先秦偽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06；還有，董立章：《國語譯注辨析》（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

¹⁶ 殷孟倫：〈《國語》哲學思想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第1期（1984年3月），頁31—35。

二、關於年代的討論

關於《國語》的年代問題，其實是與作者問題糾結在一起的，作者問題明則成書年代自然便會清晰。但是，作者問題已如前述，在 20 世紀至當下的一百多年中，學者們並未達成一個明確共識，而對於非一時一人所作的回答也仍舊無助於年代問題的解決。因此，對於《國語》年代問題的探討，就需要拋開作者問題的干擾，直接面對此問題本身，從而尋獲直接答案，而非再繞道其他問題曲線解答。然而，在最初單一作者撰寫全書的固定思路下，學者們對《國語》成書年代的思考，則多是以作者的確定為成書的年代坐標，借以解決這一問題的。

如上文所述，司馬遷曾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並認為「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這便成為班固所說「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漢書·司馬遷傳贊》）的直接依據。這種觀點在後世逐漸成為主流，但是司馬遷只提到左丘明是魯君子，其他相關信息並未給我們展現。與徑說《國語》為左丘明所作一樣，班固在司馬遷基礎上為我們進一步介紹了左丘明其人。其在《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下注明「左丘明，魯太史」，並在《春秋》家書目之後說：

（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恐

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由此看來，班固為我們呈現出的左丘明，較之司馬遷所說的形象更為飽滿、更為清晰，左丘明不只是魯太史，而且還與孔子同時，並為了防止孔門弟子不得孔子《春秋》之真，而作《左傳》解經。班固此論不知是否與《論語》中的相關記載有關，《論語·公冶長》曾提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論語》的這條記載或許增強了班固的論據，但是孔子所稱左丘明與作《左傳》和《國語》的左丘明是否同一人呢？查之《國語》、《左傳》，我們發現其中有的事件遠後於孔子，同理也後於《論語》之左丘明，如此一來，班固之說豈不是存在著時間上的漏洞。於是，後世學者有稱兩左丘明只是同名而已，有稱作《國語》者為左丘而非左丘明，有的學者詳細考證孔子與左丘明年歲，以證二人同時而左丘明又可以見到後時之事件，可謂用心良苦。¹⁷可以說，這諸多學者的努力很多都是功倍而事半的。因為將先秦古籍嚴定為一人所作，並將成書年代與此掛鉤，本就是不合古籍形成規律的。與此相同的還有將《國語》與《左傳》成書時代相比較，由此判定在其之前或之後，這便由與作者掛鉤轉為與某本書掛鉤，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除此之外，還有直接求解的途徑，即直接分析《國語》本身內容，借此判定其成書年代。由此，對於《國語》年代問題的探討，學者們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種，即是依作者判定年代。

¹⁷ 參見張以仁：〈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收於《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 143。

關於作者問題，上節已經詳細討論過，此處便不準備再做累述，只簡單做一考察。首先，康有為認為左丘明作五十四篇版的《國語》，而後劉歆從其割裂出《左傳》，並將剩餘部分修改為今本《國語》。依此看來，現在所見的《國語》應該成書於西漢末年。而反對康氏論點的章太炎則認為，「《國語》之成，更在（左丘明）耄期，故韋昭言，雅思未盡，複為《國語》」，¹⁸即是認定《國語》成書於左丘明晚年，也就是春秋末期。而郭沫若考證作《國語》的是吳起，這自然使得成書年代定在戰國了。¹⁹通過對作者的定位，當然可以獲得其書的成書年代，但是由於作者問題的複雜和模糊，成書年代也就因之而無法得到解決。

第二種，則是以《國語》與《左傳》比對，由此判定誰先誰後，借以確定《國語》成書年代。

在這一問題上，衛聚賢的討論最為細緻。他在《古史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國語》的作期、作地和作者問題。在書中，他使用了七種方法來分析作期即成書年代，其中，可劃歸為本類方法的有：比較明顯法，即比較《國語》與《左傳》二書對於同一事的記載，誰的語句更為明顯易懂，誰的作期便在後，或係後者采取前者；記載異同法，即研究同一事實，兩書記載相同，則非此取彼即彼取此，或取自同一史料。這兩種方法其實可以歸並為一種，即對於同一事件的比較。通過比較，衛氏認為周、齊、楚、吳四語是公元前 384 年之前的作品，而魯、晉兩語是之後的作品。²⁰

童書業也使用了衛聚賢所說的比較明顯法，其比較了《國語》與《左傳》的一些相近的段落，指出都是「《國語》文字繁於《左傳》」，《國語》百多字的記敘，《左傳》只用幾十言概括，童氏認為這就是文字上的進步，並反問「若《國語》在《左傳》之後，有良範在前，其文何致退化至此？」因此，其認定《國語》成立在《左傳》之前。²¹

幾十年之後，譚家健繼續使用這種比較法。他分析了《國語》、《左傳》兩書文句相同的部分，認為在記言上，「《左傳》大都比《國語》精粹通俗」，而記事上，「《左傳》往往比《國語》詳細具體，藝術技巧有明顯提高」，至於兩書在一些細節上的不同處，則是《左傳》訂正《國語》的差錯。同時，譚氏又在思想方面拓展了新的比較領域，他認為兩書「體系雖然相近，但並不一致，而且有後者發展前者的痕跡」，例如，《國語》雖然也尊孔，但是其書中的孔子並非《左傳》所描述的聖人形象，而且《國語》中含有多家學說思想，而非單單儒家一門；又如《國語》中民神並重，而《左傳》則是民重於神，《國語》談尊君，而《左傳》更多的是重民。因此，譚氏最後得出結論，「《國語》成書當在《左傳》稍前，其時當在春秋末和戰國初。」²²

¹⁸ 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章太炎全集》，頁 252。

¹⁹ 郭沫若：〈述吳起〉，收於《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509。

²⁰ 衛聚賢：《古史研究》，頁 164—226。

²¹ 童書業：〈《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收於《左傳論文集》，頁 169。

²² 譚家健：〈關於《國語》的成書時代和作者問題〉，《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這種方法是試圖以《左傳》為時間坐標，通過對兩書同一事件記敘的比較，或者是思想方面的比較，得出《國語》成書在《左傳》或前或後的結論，從而最終確定《國語》的年代。但是，這一方法的關鍵在於《左傳》年代的確定，而《左傳》年代也同樣存在著疑問，這又如何為《國語》提供可靠的時間坐標。

第三種，是立足於《國語》自身，從其本書中分析考察，以判定其成書年代。

衛聚賢所說七種方法，除上述兩種外，其餘五種都屬對《國語》自身的考察。其中包括，一、佈局異同法，即全書各篇佈局大多數一致者，必出自一人之手，否則必非一人手筆；二、文體異同法，即全書各篇文體大多數一致者，必出自一人之手，否則必非一人手筆；三、呈現本能法，即書中某類事記敘精詳，作者必長於此類事，若全書一致，則為一人作品，否則非一人作品；四、文法變遷法，即全書文法相同，則為一時代作品，否則非一時代作品；五、本身考定法，即就書之本身考定作期。衛氏這五種方法，其實主要是用於考察《國語》各篇異同的，其中屬文體、文法、與本身考定三法最具普遍性，佈局與呈現本能並無太大價值。通過諸種方法，衛氏分別得出了《國語》各篇成書的先後次序。²³

童書業則考察了《國語》書中的思想，認為戰國晚期後的思想潮流並未反映到《國語》書中，由此，童氏證明《國語》是戰國時期的作品。²⁴當然，最為直接的，也是最為簡易的，就是針對《國語》書中的事件定位成書時間。如洪業認為《晉語》中載趙襄子，則時間下限至少到襄子卒年，即公元前 425 年；或者根據書中所載星象，推定時間為公元前 364 年左右。還有依據書中的文字來定位時間，如書中「霸王」一詞頗似六國時語，所以應在公元前 370 年梁惠稱王後；又如書中避秦莊襄王諱，而不避秦始皇諱，所以成書時限應在六國之末，或楚漢相爭之際。²⁵採取同樣論證方法的還有楊伯峻²⁶和沈長雲²⁷。只不過，沈氏增加了對典章制度的考察，認為書中提及的一些制度都不應存在於春秋時代。而且，《國語》各篇成書時間也不一致，但總體成書年代不應早於戰國晚期。²⁸

而王樹民則是綜合運用了文體、思想比對《國語》各篇的成書年代，認為周、晉、鄭、楚四國之《語》及《魯語上》「文多古樸」，寫作時代應該較早；《魯語下》多記瑣事，甚至空

²³ 衛聚賢：《古史研究》，頁 164—226。其實，五種方法都屬於廣義的本身考定，但此處的第五法是就書中提示時間的內容而言的。

²⁴ 「夫戰國晚期以後出現之古帝王多矣，如伏羲氏，神農氏，女媧氏，帝繫氏等，何皆不見於《國語》中乎？孟子以後，盛傳舜象之故事，何《國語》中不一及之乎？帝繫以後，帝系說大張，《國語》雖亦有其帝系說，何與漢以後所傳者大不同乎？戰國晚期以後，五德終始說亦大張，《國語》中何亦無其蹤跡乎？」童書業：〈《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收於《左傳論文集》，頁 163。

²⁵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頁 84—87。

²⁶ 「考《鄭語》部分有楚威王伐越事，則已在公元前 329 年，而又有鄒國在王赧時被滅，那又在公元前 314 年後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春秋左傳注》，頁 44。

²⁷ 沈長雲仍舊採趙襄子事。

²⁸ 《周語中》提到畿服和五等爵制，《魯語下》提到「三公九卿」，《晉語二》提到郡縣之制，《晉語四》提到「將軍」和歲星紀年，《齊語》提到軌、里、連、鄉之制以及都鄙規劃中的齊國人口，等等。沈長雲：〈《國語》編纂考〉，收於《上古史探研》，頁 329—332。

事說教，「殆七十子後學所為」；《齊語》全同於《管子·小匡》，「蓋出於稷下先生之手」；《吳語》、《越語》「專記二國爭霸事而多兵權謀之語」，尤其《越語下》只記範蠡，「多黃老之言」，「語言講求對仗押韻」，時代當最晚。因此，《國語》一書非一時一人之作，但最晚不早於戰國末葉。²⁹

在考察諸位學者關於《國語》年代的研究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如同作者問題一樣，各位學者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共識可言。但是，諸位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卻是非常的一致，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以下幾種研究方法，而這些研究方法也正是學者們運用在作者問題考察上的。即：一、文法考察；二、同事比較；三、語匯考察；四、思想考察；五、文體考察；六、本身考定。

三、方法的考察與文本的開放

通過對《國語》作者和年代研究的梳理，我們並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這無疑說明了兩個問題存在著極大的複雜性。從一開始，司馬遷的模糊化表述便為後世學者留下了馳騁想象的空間，從而導致最終共識的缺位。但是，除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和模糊性之外，經過上述對以往研究的考察，我們也開始懷疑解決問題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方法的不當，或許是導致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的重要原因。

無論是對作者還是對年代的研究，高本漢的研究方法無疑是將相關研究帶入現代學術的關鍵所在。隨後，學者們在其文法比較法基礎上，增加了文體、思想、同事、語匯、本身考定等多種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與傳統單純對文體、事件等直觀問題的分析相比，無疑是現代學術發展所帶來的新成果，而且進一步推動了現代學術的發展。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這些方法自身存在著種種問題，也就是說標尺本身缺乏精確性，由此衡量的結果自然就不具信服力了。其實，在當初疑古風潮正盛時，胡適便對其研究方法進行過審查。在當時，這些研究方法被普遍運用於古書考察，只是胡適所審查的方法是被用於《老子》年代研究的，而本文所關注的則是《國語》的相關問題而已。

在這篇名為《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的文章中，胡適首先認為「思想系統」或「思想線索」不足以證明《老子》年代，他舉《論語》「無為而治」的思想為例，他本人認為這句話說明孔子受了老子影響，但是同樣的論據，顧頡剛卻得出《老子》作者承襲孔子的結論。胡適不僅大呼：「這個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觀的成見的，是一把兩面鋒利的劍可以兩面割的。」隨後，胡適又考察了文字、術語、文體等研究方法，指出用其考證年代同樣含有不確定性，如關於《老子》的文體，馮友蘭認為是簡明經體，而顧頡剛則認為是賦體；而《老子》中的「天下」、「王侯」等名詞，在《易經》、《論語》中同樣含有，因此，

²⁹ 王樹民：〈《國語集解》前言〉、〈《國語》的作者和編者〉，《國語集解》，頁4，頁602、603。

這些都不足以成為論證年代的證據。³⁰

時至今日，胡適的上述審查工作同樣有效，而且由於近年來大量簡帛文獻的出土，使我們對於先秦古籍有了一個更為直觀的印象，特別是與傳世古書比對之後，上述研究方法顯得更為不準確。如以應用最為廣泛的文法考察為例，通過對《老子》竹簡本（郭店竹簡）、帛書本（馬王堆帛書）、傳奕本以及通行本（河上公注本與王弼注本）等五種版本的比較，劉笑敢指出《老子》在傳佈過程中存在著改善文本的現象，即為追求句式的整齊，通行本較之簡帛本刪減了大量虛詞以增加四字句式，同時又大大強化排比和對仗等修辭手法。³¹由此看來，文法和語言方面的劇烈演化，使得我們對《老子》一書的文法考察變得毫無意義。其實，《國語》中也存在著這種現象，如張以仁在以文法考察《國語》時，發現所得結果與馮沅君相差很大，最後發現是由於版本的差異導致的，《國語》明道本與馮氏所依據的版本在助詞的統計上差距甚多。³²兩種版本都是傳世本，在文法上尚有如此大的差距，更不需說兩千年前的早期版本了。因此，文法上的考察是非常不準確的，我們無法通由此徑得出客觀結論。另外，如文體問題，通過《老子》的傳佈來看，王樹民所說《周語》「古樸」，《越語》「語言講求對仗押韻」等證據並不是十分可靠，用於說明《國語》各篇風格不同則可，用於證明著作年代早晚則不可。因為我們無法確定某種文風出現的早晚，更無法保證古書流傳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修改。思想上的考察也同樣如此，任何一種思想都不會是突然的出現，而必是前有端緒，後有傳佈，因此，我們無法確證某種思想的產生時間，也就無法根據飄忽的思想確定兩書的早晚或者一書的年代。語匯和本身考定中的事件、制度等等，也存在著後世修飾、增益的可能。

其實，從出土簡帛文獻來看，古書的傳佈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在此，我們參考李零對出土簡帛與傳世古書體例的相關研究，對古書傳佈情況做一闡述。首先，在先秦時期，書籍一般是不題寫作者姓名的，余嘉錫所總結古書體例之一便是「古書不題撰人」³³，因為那時很多都是所謂官書，並沒有一個明晰的作者概念。即便有了諸子著作，也並非都出自本人手著，而是其弟子門人相與編錄，這期間又依個人所見所聞，對其書內容增益、修改、注釋。據李零的觀察，就出土簡帛來說，便從未出現過有題寫作者名姓的情況。³⁴其次，先秦古籍大多是單篇流傳的，而非後世所理解的集結成固定書冊。如《晉書·束皙傳》所載汲冢古書中有《國語》三篇，有的學者認為是殘本。其實，先秦古籍多是單篇行世的，此三篇也是如此，並非

³⁰ 胡適：〈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收於《古史辨》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387—410。

³¹ 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9、10、20、23。

³² 在對《國語》「于」和「於」的考察中，張氏所據明道本「於」字的一種用法要比馮氏少33處之多，因此與「于」字大致相等，便不會得出馮氏的結論。張以仁：〈從文法、語匯的差異證《國語》、《左傳》一書非一人所作〉，收於《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83。

³³ 余嘉錫：《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00。

³⁴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收於《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

殘本。即使到了魏晉時期，雕版印刷出現之前，古籍流傳也是如此。³⁵最後，先秦古籍多經後人增益、修飾，李零在校讀出土本《孫子》過程中，便發現今本往往將古本難懂的字換為通俗的字，而且喜歡增加虛詞、助詞，把散文改為對句，甚至添加後世的事件。³⁶這在上述劉笑敢關於《老子》諸種版本的比較研究中也得到證明。

由此我們再反觀《國語》一書，其傳佈過程大致也與上述規律相符。最初，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我們不知道歷史是否真如其所言有此之分劃，但是依照《國語·楚語》所載，楚大夫申叔時建議楚太子傅如何教育太子時便曾說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就此看來，「語」確是當時貴族教育中的一種重要教材。而且大概這種「語」各國都有，為數不少，現今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以及上博簡中的大量古書都可以反映當時的情境。³⁷而《國語》也一定與這些古書相似，其取材想必也大致相同。所以，現代作者概念在這裏便不再適用，而應該更為準確地稱為編撰者。而這位編撰者在選擇材料時所面對的便是上述稱為「語」的大量材料，所以《國語》是采集多種材料而成的，這也已經為學者所證明。³⁸但是，這位編撰者對於材料的選取是有一定標準的，而非雜亂地匯編材料。其標準即是明德、敬神、愛民，與此相關材料便可入選，這從《國語》書中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到這一主題。但是《國語》編成之後，如同大多數古書一樣，開始了其被附益、增飾的過程。除了簡單的語言修改之外，以事件為綱目的形式也決定了《國語》可以更容易的被改編。因為這種形式，又加之古書單篇流行的情況，使得後人可以《國語》主題為標準，繼續對其中的材料進行編輯甚至更換，即如《太平御覽》所引幾條《國語》材料便不見於今本³⁹。如其中《兵部》「決戰」條引「《國語》曰」：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斗，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隨進斗，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⁴⁰

這段事件完全符合《國語》體例，可作為書中的單獨單元存在，但此條卻整段佚失，不見於

³⁵ 《世說新語·文學》中載眾人聚會讀《莊子》，只找得《漁夫》一篇，說明當時《莊子》只是單篇分行。

³⁶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頁31。

³⁷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二版（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294—298。

³⁸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頁81；譚家健：〈關於《國語》的成書時代和作者問題〉，《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³⁹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頁84、85。

⁴⁰ [宋]李昉編，夏欽鉉等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卷311，頁795、796。

今本。從其佚失情況來看，我們可以更為形象、具體地明瞭上述所說《國語》的編輯過程，即編輯者可以根據全書主題，依照相同時期、相關題材的材料，整體刪除或增添書中條目。《太平御覽》已是宋代作品，尚且如此，我們更可以上推更早時期類似的情形，這同時也可以很好的解釋《國語》中那些時限靠後的事件、語匯、制度甚至思想的出現。

由此，我們可以將《國語》稱為一種開放文本。何謂開放文本，我們可舉互聯網中維基百科或百度百科為例，以更好地理解這一概念。在互聯網的維基百科或百度百科中，當一位作者建立一個詞條之後，這個詞條便處於一種開放狀態，可以由任何人附益、增飾，甚至刪改。在詞條最終定型之前，修改工作可能會經歷很長一段時間，而在這種反復增飾、修正之後，最終詞條會達到一個大多數人都可接受的樣貌，此時文本也就固定下來，較少會出現變動了，而一個完整詞條也使最終完成。這種處於開放編輯狀態的文本，我們可稱其為開放文本。《國語》的情況大概也與此相似，因此，在開放文本的視角之下，我們可以將《國語》的編撰者視為一個群體，而其編撰年代將成為一個時間段，也就是說，《國語》是由若干編撰者在一段時期內完成的（一些學者所主張的《國語》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的論點也可做此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語》的編改是完全隨意化的，其最初的版本與今本雖然有差異，但主體是相同的，而這正是其作為著作的本質所在，否則其便會失去作為著作的合法性，而成為可以任意更換的資料夾。這一切都是因為《國語》鮮明主題的存在。主題的存在，意味著一定存在一位主要的編撰者，這樣才可將這一主題確立並貫穿於編選之中。而這位編撰者依據主題完成《國語》的編選時，也就意味著作為一本特定著作的《國語》的出現，而不必如後世學者那樣，將成書年代定在最晚的時間點上。因此，《國語》的最終完成雖然是持續一段時期的群體工作，但最初那位主要編撰者完成編撰之日也便是《國語》之為《國語》確立之時。這也如同網絡百科中的詞條一樣，當作者最初完成詞條的寫作之後，詞條也即宣告形成，之後其他編者的工作也只是增飾、修改而已。

至於這位編撰者，除了司馬遷提供的一些線索之外，我們並沒有確定的證據證明定是左丘明，這便是古書不題撰人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吧。與其不經考察的接受左丘明作《國語》的舊說，不如更為謹慎地依據有效線索劃定大致範圍。這一有效且唯一的線索即是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左丘失明，厥有《國語》」。⁴¹先前，我們已談到，此處之左丘並

⁴¹ 關於此條證據的準確性，歷來有學者持質疑態度。如崔述稱「《世紀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誣，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也。且列左丘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為即作傳之左丘明否，不得強指為一人也，故今不採此文。」（[清]崔述：《洙泗考信餘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排印《畿輔叢書》本），卷3，頁52。）崔氏此論即是針對司馬遷「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太史公自序》）而發。其「不得強指為一人」的結論可採，但其論證不可採。楊伯峻也同樣有此質疑，認為呂不韋非遷蜀作《呂覽》，韓非也非囚秦作《說難》、《孤憤》，並進而認為「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也是如此，是不足信的，是司馬遷寫文章而非寫史書。（楊伯峻：《〈左傳〉伯峻學術論文集》（長沙：

無確切證據證明為左丘明，而對於此左丘是姓左名丘，還是複姓左丘，我們也並不會繼續糾結於此類傳統猜想。在現有證據下，我們只知道有關《國語》編撰者的論述，唯有這一條具有有效性。而據此一條證據，我們也僅能獲得編撰《國語》者乃是司馬遷所說之左丘的結論。而對於這一左丘的情況，我們知之甚少，但是依據現有材料，我們仍可以了解一二。我們知道，《國語》是依國別分章的，其中，最多的便是《晉語》，全書二十一篇中獨占九篇，由此我們可以做最低限度的推斷，即編撰者左丘是三晉之人，至少是與之接近之人，這是極有可能的。⁴²而有關《國語》的年代，據《晉書·束皙傳》所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中有「《國語》三篇，言楚、晉事」，這三篇已如上述，是古籍單篇行世的例證。此處已經有《國語》之名，而且題名最可能是書中原有的，因為這些書「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七篇因為折壞所以不知道題名，那即是說這些書原都是有題名的，所以《國語》一名應是書中原有的。而且，據行文語氣，出土《國語》

（嶽麓書社，1984年），頁212—214。）文王、孔子之下，屈原或許并非被放逐而作《離騷》，《呂覽》、《說難》、《孤憤》也並非呂不韋、韓非遭難時所作，但是其中作者與作品的關係是非常明確的，文王與《周易》、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也是久傳舊說，可疑的只是何時、何地而作。因此，在對是否失明存疑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認定「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敘述的準確性。

⁴¹ 王樹民便是持此論者，他認為司馬遷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左丘與作《左氏春秋》之左丘明並非同一人，編《國語》者即是左丘。又根據《晉語》所占篇幅多，而《晉語》中又記趙氏為多，認為左丘是趙國人，或是與趙國接近之人。但是，王氏認為司馬遷所列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孫臏、呂不韋、韓非皆是以時間先後為次序，而左丘「列於屈原與孫子之間」，所以應是戰國中期人。（王樹民：〈《國語》的作者和編者〉，《國語集解》，頁603、604。）在此之前，孫海波也通過考察時間先後次序得出同一結論，認為作《國語》者是戰國人。（孫海波：〈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第16期，頁169。）但關於諸人時間先後，也並非毫無問題，張以仁便考證所謂孫子臏腳當在屈原出生之前，不應次於其后。（張以仁：〈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149。）因此，通由此法考定編撰者年代是需要商榷的。譚家健也通過分析《晉語》所占《國語》篇幅為多，而得出《國語》成於三晉史官的結論。（譚家健：〈關於《國語》的成書時代和作者問題〉，《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7。）沈長雲同樣由此得出《國語》成於三晉人之手。（沈長雲：〈《國語》編纂考〉，收於《上古史探研》，頁332。）成書年代論述，收於《楊伯峻學術論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頁212—214。）文王、孔子之下，屈原或許并非被放逐而作《離騷》，《呂覽》、《說難》、《孤憤》也並非呂不韋、韓非遭難時所作，但是其中作者與作品的關係是非常明確的，文王與《周易》、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也是久傳舊說，可疑的只是何時、何地而作。因此，在對是否失明存疑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認定「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敘述的準確性。

⁴² 王樹民便是持此論者，他認為司馬遷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左丘與作《左氏春秋》之左丘明並非同一人，編《國語》者即是左丘。又根據《晉語》所占篇幅多，而《晉語》中又記趙氏為多，認為左丘是趙國人，或是與趙國接近之人。但是，王氏認為司馬遷所列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孫臏、呂不韋、韓非皆是以時間先後為次序，而左丘「列於屈原與孫子之間」，所以應是戰國中期人。（王樹民：〈《國語》的作者和編者〉，《國語集解》，頁603、604。）在此之前，孫海波也通過考察時間先後次序得出同一結論，認為作《國語》者是戰國人。（孫海波：〈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第16期，頁169。）但關於諸人時間先後，也並非毫無問題，張以仁便考證所謂孫子臏腳當在屈原出生之前，不應次於其后。（張以仁：〈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149。）因此，通由此法考定編撰者年代是需要商榷的。譚家健也通過分析《晉語》所占《國語》篇幅為多，而得出《國語》成於三晉史官的結論。（譚家健：〈關於《國語》的成書時代和作者問題〉，《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7。）沈長雲同樣由此得出《國語》成於三晉人之手。（沈長雲：〈《國語》編纂考〉，收於《上古史探研》，頁332。）

應是與當時傳本相同的，至少不會大異，因為其他出土諸書與當時傳本都有對照，如有出入都有所說明。⁴³因此，依照現有證據，《國語》最早有史記載是安釐王卒年，即公元前 243 年，而其編撰則應在此之前。最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位三晉人士左丘於公元前 243 年之前，根據當時材料編撰了這部《國語》。

⁴³ 張以仁：〈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張以仁先秦史論集》，頁 68、69。

參考文獻

- 1、卜德：〈《左傳》與《國語》〉，《燕京學報》第16期（1934年12月）。
- 2、王樹民：2002，〈《國語》的作者和編者〉，《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 3、沈長雲：2002，〈《國語》編纂考〉，《上古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
- 4、李零：1998，《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5、李零：2004，《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
- 6、李寶通：〈「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新解〉，《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6年11月）。
- 7、胡適：1982，〈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8、洪業：1983，〈春秋經傳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9、徐仁甫：1981，《〈左傳〉疏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10、孫海波：〈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第16期（1934年12月）。
- 11、師璐露：〈近十年來《國語》文獻與文學研究述評〉，《綏化學院學報》第6期（2009年12月）。
- 12、張以仁：1980，《國語左傳論集》，臺北：東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3、張以仁：1980，《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14、張以仁：2010，《張以仁先秦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 15、殷孟倫：〈《國語》哲學思想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第1期（1984年3月）。
- 16、陳新雄、于大成編：1976，《左傳論文集》，臺北：木鐸出版社。
- 17、梁濤：〈20世紀以來《左傳》、《國語》成書、作者及性質的討論〉，《邯鄲學院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
- 18、劉建國：2004，《先秦偽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19、劉笑敢：2006，《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衛聚賢：1928，《古史研究》，上海：新月書店。
- 21、譚家健：〈關於《國語》的成書時代和作者問題〉，《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5年6月）。
- 22、譚家健：〈歷代關於《國語》作者問題的不同意見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第7期（1994年7月）。
- 23、顧立三：1983，《左傳與國語之比較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